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第 8 卷第 4 期

（总第 29 期）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岳昌君

编辑：孙冰玉

## 高校学生参与度及其成长的影响机制 --- 2010 年首都大学生发展数据分析

朱红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 100871）

**摘要：**本研究使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2010 年度“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学生参与度（student engagement）与大学生成长(achievement)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学生在大学的学习生活参与程度是影响学生成长最为关键的因素，验证了阿斯丁等学者的学生参与度理论在中国大学情境下的适切性。研究数据表明学生参与度对学生成长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学生的校园互动会通过影响学生参与度而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学生参与度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类型的院校中存在显著差异。最后，本研究建议政府和大学应该审慎地思考传统的、割裂式的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两分的模式，逐步打破现有的“教书不育人、育人不教书”的文化和制度隔阂，构建生活-学习一体化的大学环境，积极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和发展。

**关键词：** 学生参与度 高等教育质量 校园互动 大学生成长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0 annual data set of Beijing College Student Survey, this paper examined relationships among student engagement, campus interactions, and college student achievement by employ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he findings include: [1] student engagement in classroom learning, learning outside of classroom, multi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extra-curricular participan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college student achievement; [2] interactions with faculty, student affairs professionals, and peer students positively impact student engagement; [3] among different type of institutions, how student engagement and interactions effect student development varies.

## 一、 学生参与度：对教育过程的有效监控

对教育过程的有效测量和监控已经成为全球评估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新模式，这种评估模式能够有效帮助大学从内部进行人才培养的管理改革。<sup>1</sup>学生参与度(Student Engagement)是这种过程性评估模式的核心概念，一般是指学生在课堂内外、有效教育活动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大学所创造的促进学生参与这些教育活动的服务和条件。学生参与度被认为是影响高等教育成果的重要因素，能够帮助大学更好地认识学生学习的质量，并理解学生有效学习发生的过程和机制，从而促进大学做出相应的改进。<sup>234</sup>学生参与度将学生在大学的学习生活过程与高等教育成果关联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从关注大学教育的结果(outcomes)到同时关注大学教育过程(process)的转变。比如，美国全国大学生参与度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正是基于学生参与度的理论，旨在通过调查大学生在有效教育性活动的参与程度及其特征，分析和评估大学的教育质量，对高校内部改革提出实证数据的支持。<sup>5</sup>

随着对质量问题关注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也开始关注“学生参与度”等过程性指标的测量和分析。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学生参与度的概念、测量工具和影响力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sup>678910</sup>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自2006年开始进行每年度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以下简称年度调查)也是基于对学生参与度的关注，调查首都不同类型高校学生成长的现状和学习生活方面的参与程度。该调查采用学生自评问卷形式，除了收集学生详细的个人背景信息，如年龄，性别，出生地，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高中学习状况，

---

作者简介：朱红，讲师，陕西三原人，研究领域：大学生发展，学生事务管理，院校研究等。Email: hongzhu@pku.edu.cn。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2010战略课题(BJSE2010ZL01)；中国高教学会、新世纪教学研究所2009年重点规划课题“影响高等院校本科教学质量要素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

<sup>1</sup>金子元久.大学教育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0-115.

<sup>2</sup> Astin, A.W. (1993). *What matters in college: Four critical years revisit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up>3</sup> Pascarella, E. T., Terenzini, P. T. (2005).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Findings and insights from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sup>4</sup> Kuh, G. (2001). Assessing what really matters to student learning: Inside th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Change*, May/June, 10-18.

<sup>5</sup>海迪 罗斯, 罗燕, 岑逾豪.清华大学和美国大学在学习过程指标上的比较:一种高等教育质量观.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 29(2), 36-42.

<sup>6</sup>罗晓燕,陈洁瑜.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美国 NSSE“全国学生学习投入调查”解析](#)[J][比较教育研究](#), 2007,(10).

<sup>7</sup>陈琼琼. 大学生参与度评价:高教质量评估的新视角——美国“全国学生参与度调查”的解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9,(01).

<sup>8</sup>陆秋萍. [美国 NSSE 视角下的大学生学习质量探讨](#)[J][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 2010,(02)

<sup>9</sup>周作宇,周廷勇. [大学生就读经验: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新视角](#)[J][大学\(研究与评价\)](#), 2007,(01)

<sup>10</sup>罗燕, 海蒂 罗斯, 岑逾豪.国际比较视野中的高等教育测量—NSSE-China 工具的开发:文化适应与信度、效度报告. [复旦教育论坛](#), 2009,7(5), 12-18.

以及大学年级和专业等信息外,重点了解学生在三个方面的自我报告数据:(1)大学期间的学习参与、社会情感参与程度;(2)对大学环境的感受和满意度;(3)在大学期间的学业成果、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的发展。

## 二、理论基石与实证发现

学生参与度概念的源于北美学生发展理论和大学影响力理论。学生发展理论将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发展更多的视为一个自主发展的过程;而大学影响力理论则强调大学生在高校期间的成长是受外在因素影响的因果关系,强调高校环境、组织特征、社会化互动等因素对学生大学期间能力发展的影响作用。这两类理论互为补充,从不同角度阐释学生大学成长过程的影响机制,是学生参与度概念产生的基石。学生参与度一方面强调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要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努力程度,另一方面强调高校要创造环境和条件激励学生的这种参与度。阿斯丁的学生涉入理论(Student involvement)是学生参与度概念的基石,该理论首次指出学生在有意义的教育活动中投入时间越长,付诸的努力和精力越多,则收获越大。<sup>1</sup>佩思(G. Pace)则进一步提出: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时间长度,也应该关注其努力的质量(Quality of Effort)。乔治库(G. Kuh)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生参与度的概念,认为学生参与度要具有双重核心特征:首先是学生在学习和其他教育活动中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程度,其次是大学如何分配资源、组织课程,如何提供其他学习机会和服务,从而加深学生参与度,最终促进理想的教育产出。

为了解释大学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力,阿斯丁、丁托(Tinto)、帕斯卡雷拉(E. Pascarella)、魏德曼(Weidman)、乔治库等人建构了不同的理论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大学生的就学经验或学习生活参与度是影响学生成长的关键因素,而学生个体与教师、管理人员和同辈的互动关系(以下简称校园互动),又是影响学生参与度的重要因素。这些互动关系和学生参与度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各个方面的成长和发展。<sup>2</sup>帕斯卡雷拉和特伦兹尼(P. Terenzini)在《大学是怎样影响学生的发展》(*How College Effects Student*)一书中对学生参与度与学生成长的关系总结道:“大学对学生影响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生个体的努力程度以及参与程度所决定的。大学里所有政策、管理、资源配置等都应该鼓励学生更好

<sup>1</sup>Astin, A.W. (1984). *Excellence and Equity in American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sup>2</sup>Pascarella, E. T., Terenzini, P. T. (2005).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findings and insights from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地参与到各项活动中来。<sup>1</sup>

国外学者还进行了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实证研究,检验学生参与度对大学教育成果的影响力。这些研究验证了国外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参与度对学生成长的积极影响作用。比如,Harper和Quaye对分析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研究者发现了学生参与度与认知和智力技能发展的正向关系;对大学生生活调整和适应的积极促进作用;对道德和智力发展的影响作用;对操作能力和可转移技能、对社会性发展、自我认知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作用。<sup>2</sup>尽管各个研究的具体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些实证研究支持一个基本结论:只有全面地参与到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中,学生才有可能在不同维度最大限度的成长和发展。

同时,关于校园人际互动的实证研究发现:同辈辅导<sup>3</sup>、师生互动<sup>456</sup>、学生事务工作人员<sup>7</sup>都会对大学生的培养质量起到积极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些研究中都将大学中的人际互动视为学生参与的一部分,鲜有研究以学生参与度为中介变量,检验大学生的校园互动、学生参与度和教育成果(学生发展)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目前,我国学者也开始对学生参与度的现状和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对学生参与度与学生对高等教育质量满意度的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sup>8</sup>学生的课堂学习程度和某些课余活动参与,对课程成绩、知识获得和认知发展的自我评价会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sup>9</sup>与辅导员的交往也会对学生的自信心、学习动力和生活目标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条件性的,其影响力在不同学生群体中存在差异。<sup>10</sup>还有研究进一步指出本科生与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参与程度对在校成长具有的不同影响机制,学习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和集体活动参与的积极与否对个人能力发展有着显著影响。<sup>11</sup>

<sup>1</sup>陈琼琼. 大学生参与度评价:高教质量评估的新视角——美国“全国学生参与度调查”的解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9,(01) .

<sup>2</sup> Harper, S.R.& Quaye,S.J.(2009).Student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diverse popul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sup>3</sup>Merisotis, J. P., & Phipps, R. A. (2000). Remedi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ats really going on?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4(1), 67-85.

<sup>4</sup>Cole, D. (2007). Do interracial interactions matter? An examination of student-faculty contact and intellectual self concept.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8(3), 248-272.

<sup>5</sup>Cole,D. (2008) . Constructive Criticism: The Role of Student-Faculty Interactions on African American and Hispanic Students' Educational Gains. *Journal of Student Development*, 49(6), 587-605.

<sup>6</sup>Kuh, G & Hu, S. (2001) . The effects of student-faculty interaction in the 1990s.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4(3), pp.309-332.

<sup>7</sup>Martin, G.L. & Seifer, T.A.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actions with student affairs profession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year of college. ASHE

<sup>8</sup>胡子祥, 雷斌.大学生参与对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8,3,104-110.

<sup>9</sup>鲍威. 扩招后中国高校学生的学习行为特征分析[A] 2008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集[C], 2008.

<sup>10</sup>朱红.个性化深度辅导与大学生发展的实证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8(1), 45-62.

<sup>11</sup>杨钊;许申.本专科学生能力发展的对比研究—基于“2008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相关数据的分析

这些研究为保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实证数据的支持,但是国内的实证研究尚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提高。首先在研究内容上,对学生参与度的关注点集中在课堂学习参与程度,缺乏对学生参与度的全面分析,比如课外学习方式,课余活动的参与,跨专业学习的参与程度等。同时,对学生参与度的影响机制研究不足,学生的参与程度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参与度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另外,我国学者对大学生校园互动的现状、目的、频率、内容做了很多深入分析,这些研究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形势下中国大学的师生关系趋于紧张和疏远<sup>1</sup>;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学生在师生互动方面状况堪忧,很多学生没有得到教师有效、及时的指导和反馈。<sup>2</sup>但是还没有研究检验校园互动对学生参与度和学生成长的影响作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多数实证研究采用描述统计或者回归分析,鲜有研究深入分析各因素之间复杂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另外国内实证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客观科学的教育测量,或者是缺乏对所用测量工具的分析评价。<sup>3</sup>国内目前的研究对学生参与度、学生成长等概念的测量指标体系单一,集中在课程学习的维度,较少涉及课外学习、跨专业学习;测量学生参与度的指标过于考虑量,较少考虑质的不同;最后多数实证研究都缺乏对测量工具可靠性的分析。本研究拟在以上三个层面进行创新。

### 三、研究框架、测量和分析方法

综合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本研究设计了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在此框架之下,本研究关注以下研究问题:

- [1]校园互动如何影响学生的大学学习中不同维度的参与程度?
- [2]校园互动和学生参与度如何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不同维度的成长?
- [3]不同类型院校中这些因素之间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假设1:学生的参与程度有质和量的区别,本研究将学生学习参与程度按照参与程度和方式分别进行测量和分析;

假设2:学生参与度会直接影响学生的成长;

---

[J].2010,30(278),17-22.

<sup>1</sup>王佳权.大学生师生关系现状研究[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9,19(2),11-13.

<sup>2</sup>海迪·罗斯,罗燕,岑逾豪.清华大学和美国大学在学习过程指标上的比较:一种高等教育质量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9(2),36-42.

<sup>3</sup>罗燕,海蒂·罗斯,岑逾豪.国际比较视野中的高等教育测量—NSSE-China工具的开发:文化适应与信度、效度报告.复旦教育论坛,2009,7(5),12-18.

假设3: 校园互动不仅直接影响学生成长, 而且会影响学生的参与程度, 进而间接影响学生的成长, 因此学生参与度对学生的成长还具有中介作用;

假设4: 学生的在校成长分为不同的维度的成长, 包括学术成长和社会性成长; 不同的学生参与度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力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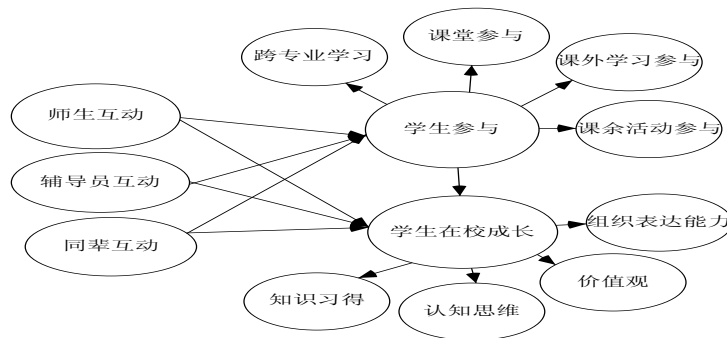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框架图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2010 年度调查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方法, 在首都 88 所各类院校中按比例抽取不同专业的学生样本, 共发放问卷 3.5 万多份。在剔除了有变量缺失值的案例之后, 共得到有效问卷 29079 份。样本数据的特征值见表 1。

表 1. 样本特征值分布表

	样本数	有效%		样本数	有效%
女性	16129	57.0	城市生源	16611	57.1
男性	12143	43.0	县镇农村生源	9893	34.0
985 院校	4728	16.6	文史哲	5972	20.7
211 院校	7501	26.3	社会科学	9315	32.3
一般本科	11215	39.4	理学	2839	9.9
高职高专	5052	17.7	农医工学	10675	37.1

本研究数据处理采用 SPSS17.0 和 AMOS17.0 软件包,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首都高校中校园互动、学生参与度与学生成长之间的直接、间接和总的关系。本研究还检验了量表的内在质量, 主要包括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建构效度检验。其次, 本研究还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不同群组之间恒等性分析的方法, 比较了不同院校之间影响机制的差异性。

校园互动、学习参与度、学生成长等量表使用李克氏 4 点计分方法, 从 4 至 1 分别表示经常(很大提高)、有时(略有提高)、很少(没有提高)和从不(降低)。学生在校成长包

括学生在知识习得, 认知思维, 道德价值观和组织表达能力四个成长维度的自我评价。学生参与度包括学生在课堂学习、课外学习、跨专业学习和课余活动等四个维度的参与程度。师生、同辈互动包括了学习、情感等不同纬度的交流内容。各维度具体测量题目和变量的基本统计量见表2。

表2 大学生校园互动、参与度和在校成长的基本统计量

			题目数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方差
互动	与教师互动	与教师、辅导员、同辈之间的娱乐休闲、学习	4	4.00	16.00	9.68	3.23
	与辅导员互动	指导、情感交流、人生激励等互动	4	4.00	16.00	10.85	3.37
	与同辈互动		4	4.00	16.00	13.43	2.45
学生参与度	课堂学习参与	做课堂笔记、参与课堂讨论、做课堂汇报等	4	4.00	16.00	11.16	2.53
	课外学习参与	课前预习、课后自习、课后与老师同学讨论	4	4.00	16.00	11.05	2.54
	跨专业学习参与	跨专业选课、与不同专业同学讨论	2	0.00	8.00	4.81	2.10
	课余活动参与	参与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文化艺术活动、讲座报告会	4	4.00	16.00	11.28	2.48
学生成长	知识活动	专业知识和理论、操作能力、发展前沿、知识面和视野	4	4.00	16.00	13.53	2.02
	认知思维能力	信息处理能力、发现与解决问题能力、批判性思维、理解认识自己的能力、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确立	5	5.00	20.00	16.22	2.70
	组织表达能力	书面写作能力、口头表达、与人相处和社会交往、外语听说和沟通能力、组织领导能力	5	5.00	20.00	15.26	2.99
	道德价值观	全球化意识和国际化视角、政治关心程度、诚信度与社会规范意识、多元文化意识、社会关心程度	5	5.00	20.00	16.23	2.79

注释: 各变量测量题目数目不同, 其分值之间不可比。

表3是整体样本的信效度检验数据。从数据可以看出, 各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大于.70(除跨专业学习外), 处于可以接受的测量学水平。所有测量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因素负荷量)均达到显著性水平。一般而言, 当因素负荷大于.71, 即可以宣称测量题项具有理想质量。邱浩正也指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受测量本质特性的限制, 量表的因素载荷都不会太高, 因此建议采用  $\lambda \geq 0.55$  的标准, 即该指标变量变异部分可被潜变量解释的百分比高于30%, 可宣称良好, 而不必坚守  $\lambda \geq .71$ 。<sup>1</sup> 本研究的数据模型中, 只有一个测量指标的因素负荷值小于0.55; 而且, 68%的测量指标的因素负荷值大于0.71, 即所属的潜在变量可

<sup>1</sup>邱皓政, 林碧芳. 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M].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以解释这些测量变量接近 50%的变异程度。以上数据均显示, 本研究中使用的各题项具有比较理想的测量质量。

**表3 测量指标变量的因子负荷值、克隆巴赫信度系数**

	与教师互动 ( $\alpha = .87$ )	与辅导员互动 ( $\alpha = .94$ )	同辈互动 ( $\alpha = .83$ )	学习参与度	课堂学习 ( $\alpha = .74$ )	课外学习 ( $\alpha = .74$ )	跨专业学习 ( $\alpha = .55$ )
VA1	.791	.881	.748	.839	.488	.729	.683
VA2	.779	.910	.810	.823	.663	.730	.575
VA3	.791	.894	.742	.762	.714	.758	---
VA4	.828	.876	.645	.662	.717	.674	---
	课余活动 ( $\alpha = .73$ )	在校成长 ( $\alpha = .92$ )	知识积累 ( $\alpha = .81$ )	认知思维 ( $\alpha = .79$ )	组织表达 ( $\alpha = .81$ )	道德价值观 ( $\alpha = .84$ )	
VA1	.707	.757	.729	.713	.655	.622	
VA2	.570	.932	.730	.758	.600	.696	
VA3	.649	.848	.758	.632	.768	.747	
VA4	.642	.777	.674	.701	.707	.730	
VA5	---	---	---	.721	.699	.753	

#### 四、结构方程模型数据结果

表4是本研究中各个模型拟合的指标。由于卡方值对样本规模比较敏感, 一般当样本规模大于一千时, 不采用卡方值作为评定模型拟合程度的判断标准。<sup>12</sup> 根据 GFI, IFI, CFI 等拟合指标的综合判断, 本研究中全体样本模型和各类院校模型拟合良好。

**表4 模型拟合指数**

	Chi-square/DF	GFI	IFI	CFI	NFI	RMSEA	RMR
全体样本模型	67.079	.897	.903	.903	.902	.048	.031
985 院校模型	11.984	.888	.890	.890	.891	.048	.030
211 院校模型	18.608	.888	.892	.892	.887	.048	.032
一般本科院校模型	26.918	.895	.902	.902	.899	.048	.031
高职高专院校模型	12.931	.883	.914	.914	.908	.049	.036

表5呈现了三种校园互动形式对学生参与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即各因素对学生参与度的影响作用。整体而言, 与教师互动、与同辈互动、与辅导员互动均对大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参与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但是三类互动对学习生活的总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sup>1</sup>邱皓政, 林碧芳. 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M].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100-101.

<sup>2</sup>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 的操作与应用[M].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是 0.504 (教师互动), 0.299 (同辈互动), 0.067 (辅导员互动)。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对其总体参与度的作用最为明显; 与同学之间的交往是总体参与度的次级重要影响因素; 而与辅导员的互动对其总体参与度的影响作用比较微弱。对于四种具体的学习参与度, 三类互动的作用呈现出与总体参与度比较一致的趋势, 即教师互动的影响作用最大, 其次是同辈互动的的影响, 最后是辅导员的作用。三类互动均对学生跨专业学习参与度影响力最小, 对课余活动参与的影响力较大, 对课堂学习和课外学习参与的影响最大。

在不同类型的院校中, 各类互动对学生总体参与度的影响仍然符合上述特征, 但是不同类型院校中存在一定的差异。就教师互动对总体参与程度的作用而言, 各类院校中的差异并不非常明显。一般本科院校和 985 院校中, 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对其总体参与度的作用略微大于 211 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 而一般本科院校的教师互动的作用又尤为显著。与辅导员的互动在不同院校中差异非常显著。985 院校中, 与辅导员的互动对学生总体参与度的影响作用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211 和一般本科院校中, 与辅导员的交流对学生学习参与度的影响作用微弱(约为 0.06); 但是在高职高专院校中, 辅导员的作用力明显提高(0.122)。也就是说与其他院校的学生相比, 高职高专学生和辅导员的交流增加, 他们的学习生活参与程度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同辈互动的影响力随着院校精英性质的减弱而变小, 在 985、211、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的系数分别是: 0.356, 0.310, 0.289, 0.201。高职高专院校中, 同辈互动的的作用力明显低于于其他类型的院校, 这可能与这些院校开展学生活动的数目和质量、生源范围、学生住宿状态、以及更加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如留学生人数)等因素有关。

表5 各因素对学习参与程度的影响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

	对总体学习参与度 (直接影响)	对课堂参与度 (间接影响)	对课外学习参与度 (间接影响)	对跨专业学习 (间接影响)	对课余活动参与度 (间接影响)
<b>与教师互动(整体)</b>	.504	.423	.415	.333	.384
985 院校	.504	.422	.400	.335	.387
211 院校	.494	.418	.398	.345	.366
一般本科院校	.515	.447	.432	.332	.394
高职高专院校	.491	.439	.426	.303	.369
<b>与辅导员互动(整体)</b>	.067	.056	.055	.051	.044
985 院校	.026*	.022	.021	.017	.020
211 院校	.059	.050	.047	.041	.044
一般本科院校	.063	.055	.053	.041	.048
高职高专院校	.122	.109	.106	.075	.092
<b>与同辈互动(整体)</b>	.299	.251	.246	.228	.198

985 院校	.356	.298	.283	.236	.273
211 院校	.310	.262	.250	.216	.230
一般本科院校	.289	.250	.242	.186	.221
高职高专院校	.201	.180	.174	.124	.151

注释: \*表示在 0.1 的水平下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其余  $p < 0.001$

表 6 呈现校园互动、学生参与度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成长的影响作用, 其中包括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的的影响。数据验证了本研究关于学习参与度的理论假设: 学生学习参与度对学生成长的积极影响作用最为显著。学生自身的、全面的努力程度是影响其在大学成长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对学生不同具体维度的成长分析,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图 2 所示, 在知识积累、认知思维和组织表达能力提升、以及道德价值观树立等方面, 学生参与度积极作用都显著高于同辈互动、与教师互动和辅导员互动的作用。

三类互动对学生成长的自我评价影响系数分别是: 0.314 (同辈互动), 0.212 (教师互动), 0.174 (辅导员互动)。与同学、教师和辅导员的互动都会对学生在大学的成长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同辈互动对学生成长的总影响力仅次于学生参与度的作用, 其影响力明显高于与教师和辅导员互动的作用, 而且同辈互动对学生成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均非常显著。

与教师的交流总体上会存进学生的成长。但是, 与教师的互动对学生成长的直接作用没有统计上显著性。教师对学生成长的总体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学生参与度的作用, 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鉴于与教师的互动潜变量是通过学生与教师的娱乐休闲互动、情感互动、学业指导激励、社会性成长指导等题目测量, 因此这一数据在一定程度表明, 我国高校中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内容局限于所讲授课程的学习, 师生之间交流方式和内容单一, 学生与教师的情感交流、课后交流对学生成长的直接影响力极为有限, 教师全面育人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但是数据同时表明, 与教师的互动通过提高学生课堂学习、课后学习、跨专业学习、以及课余活动参与等形式, 间接地促进了学生的成长。

而与辅导员的互动对学生成长的作用则是相反的机制, 与辅导员的交流对学生成长的直接作用明显大于间接作用。与辅导员的交流互动, 并不会很大程度促进学生参与度的提升。但是与辅导员的交流, 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成长的自我评价; 与辅导员的互动会直接促进学生知识的积累、认知思维能力的发展、组织表达能力提升、以及道德价值观的确立。这也许与北京高校深度辅导政策的实施、辅导员往往直接参与各类学生活动等因素有关, 通过这些政策和活动, 辅导员对学生成长发挥着直接的影响力。图 3 直观地显示了各类因素之间的作用

关系方向和大小。

上述影响机制在不同院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同辈互动的影响力随着院校研究性、精英性的减弱而减弱。在四类院校中,同辈互动的影响力分别是0.378(985院校),0.365(211院校),0.3230(一般本科)和.266(高职高专)。也就是说同辈互动在研究性大学中作用高于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中,与教师互动对学生成长的总影响显著高于211院校和985院校。这一数据验证了其他研究提出的关于我国研究型院校中师生互动显著不足的问题。究其根源,与研究型大学以研究为导向的政策、教师的科研压力等因素有关。在高职高专院校中,与辅导员互动对学生成长的作用显著高于其他三类院校,而一般本科院校和985院校辅导员的影响作用相对比较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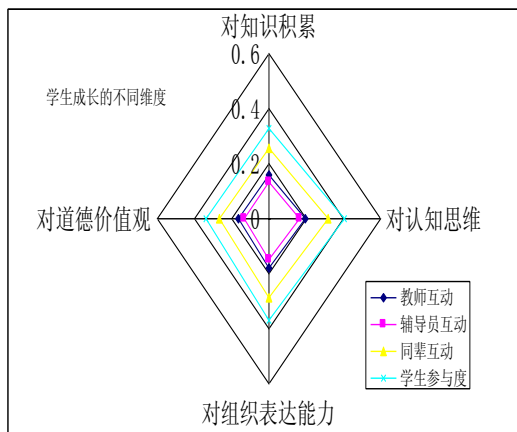


图2 学生成长的影响因素雷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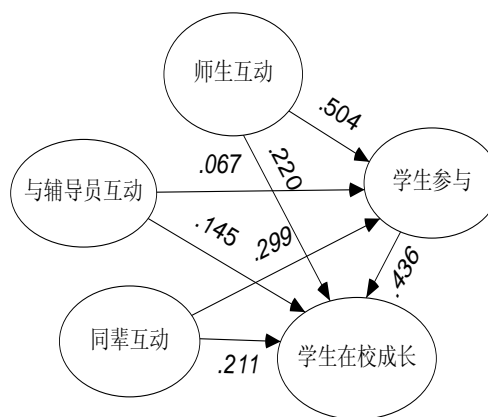


图3 校园互动、学生参与度、学生成长的影响机制

表6 对学生成长的影响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

		对学生成长	985 院校	211 院校	一般本科院校	高职高专院校
教师互动	总影响	.212	.185	.181	.256	.226
	直接	-.008**	-.029**	-.023**	.045*	.030**
	间接	.220	.212	.204	.212	.196
辅导员互动	总影响	.174	.148	.170	.142	.276
	直接	.145	.137	.146	.116	.227
	间接	.029	.026	.024	.026	.049
同辈互动	总影响	.341	.378	.365	.323	.266
	直接	.211	.227	.237	.204	.186
	间接	.130	.151	.128	.119	.080
学习参与度	总影响	.436	.424	.414	.411	.400
	直接	.436	.424	.414	.411	.400
	间接	---	---	---	---	---

Note: \*\* 表示在 0.1 的水平下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 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下没有通过检验。其余  $p < 0.001$

表7 对学生成长不同纬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总影响)

	对知识积累	对认知思维	对组织表达能力	对道德价值观
教师互动	.160	.197	.180	.165
辅导员互动	.132	.163	.148	.132
同辈互动	.258	.318	.289	.265
学生参与度	.330	.406	.369	.339

##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学生参与度是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成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一特征在不同类型的院系中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将学生参与视为一个全面的概念,包括课堂学习,课外学习;跨专业学习和课余活动等不同维度。学生在这些不同维度的参与程度越高,学生成长的自我评价就会越高。数据显示,全面、积极的学习生活参与度会促进学生在知识积累、认知思维、组织表达、道德价值等不同维度的发展。

通过加强学生与教师、辅导员、同辈之间的交往互动,学生在大学的学习参与度会得到积极地提升。不同类型院校中,不同的校园互动对度度的影响力存在差异。一般本科院校中教师互动对学习生活的参与度的作用尤为显著;在高职高专院校中,辅导员的作用明显提高;同辈互动的影响随着院校精英性质的减弱而变小,在研究型大学中影响力相对较大,而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影响相对最小。

大学生与教师、辅导员和同辈的互动会直接和间接地对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成长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但是目前大学教师对学生的课外学业指导、精神交流明显不足,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中;数据显示,与教师“课堂知识传授”之外的交往对学生的成长在各类院校中都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与辅导员的互动会直接促进学生不同维度的成长,尤其是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影响力显著,而本科院校中辅导员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但是辅导员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在学生学习方面的指导和激励工作,促进学生在专业学习方面的投入程度。

综上所述,大学的质量评价、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的改进要以促进学生在课堂内外、学习和生活的全面参与程度为主要目标和工具。本研究还显示出大学生的校园互动是学生参与度提升的重要源泉。因此,政府和大学应该审慎地思考传统的、割裂式的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两分的模式,逐步打破现有的“教书不育人、育人不教书”的文化和制度隔阂,使得学生

的专业学习环境和课余生活环境协调一致,积极促进学生的成长。大学需要以构建学习-生活一体化的大学环境为目标,加强高校中不同部门的协调合作,建立全方位、系统的、目标一致的学习生活指导体系。教师应该对走出课堂之后的学生负起在专业学习、人生发展的引导、激励和挑战等责任;高校学生工作要重视构建以促进学生学习为目标,多层次的、内容和组织手段丰富的学生课余活动。大学尤其要关注学生所处微观环境的积极改变(比如宿舍的督导制度、班集体建设、同辈交往制度和文化、课堂学习等),这些微观环境直接影响着学生在大学的成长。而改变微观环境的最有效的手段是逐步改进学校的管理理念、政策、制度和组织结构。高校要进一步注重工作理念的超越,国外一流大学先进理念的借鉴和本土化,从而促进实践工作中的改革和创新。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国高校还需要重视构建大学生同辈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体系,尤其是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实证研究证明学生课外活动的丰富程度与同辈交流有着很高的相关性,课余活动室学生在大学期间人际互动关系的一种较为正式的实现形式,它的一部分作用来源于同伴文化的影响力。<sup>1</sup> 本次调研的其他数据显示,高职高中学生在课余活动参与的频率普遍低于其他本科院校,尤其是显著低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参加课余活动的比例。比如,在985和211院校中,只有约5%的学生从不参加学生社团活动;一般本科和独立院校的这一比例增加至10%;而高职高专院校则约有13%的学生从不参加学生社团活动。这些数据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高职高专院校中有限的同辈影响力。因此,高职高专院校要进一步注重学生课余活动的建设工作,加强不同群体学生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丰富学生课余活动,加强学生辅导制度建设(peer-tutoring),通过关注和指导学生生活(比如学生宿舍的督导制度)加强构建一体化的学习社区,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和成长。

本研究存在三个主要不足。首先,本研究只是比较了不同院校的学生群体的模型恒等性分析,对其他不同学生群体,比如性别,专业,城乡差异等,鉴于文章篇幅问题,没有进一步展开分析。已有研究显示高校扩招之后,学生群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分析这些学生在学习参与度及影响机制方面的差异,很有意义。其次,学生参与度、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成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学生学习动机,家庭环境和基础教育导致的个性上的差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教师的信念、教学服务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仅就大学中校园互动的影 响作用进行了分析。未来的研究还需要深入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最后,本研究使用的

---

<sup>1</sup> Pascarella, E. T., Terenzini, P. T. (1991).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findings and insights from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数据仅限于北京地区的高校, 研究结论是否能够推广至全国范围的高校, 还有待进一步的数据检验。

---

<sup>i</sup> 关于 Student engagement 的中文翻译, 笔者和清华大学教育学院的罗燕老师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此一并感谢罗燕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建设性意见! 本文将 Student engagement 翻译为“学生参与度”。Student engagement 也常常被翻译为“学生参与”或者“学生投入”。Student engagement 通常被定义为“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ally effective practic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which leads to a range of measurable outcomes” (参考 S. R. Harper & S. J. Quaye 一书 “Student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从该定义可以看出, “参与”比较对应英文定义中“participation”一词。但是仅“参与”无法反映该概念包含的“the amount of time and effort of students”, 所以“参与度”似乎更为确切一些。第二, Student engagement 不仅强调学生个人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而且还有大学及其管理者创造条件促使学生参与到大学教育活动的含义。因此 Student engagement 还包含大学的责任。“学生投入”一词在中文中似乎更加强调个体的主动性, 较难表达这种大学承担的责任。因此, 本文使用了“学生参与度”的翻译。但是必须承认, 学生参与度无法确切表达 engagement 中 “make commitment” 的内涵。